

辞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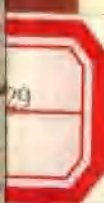
C i h a i

新知

上海辞书出版社



NO.7



目 录

第七辑

翻译时代

许 钧	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	2
汪堂家	可译性、不可译性与思维模式的转换	11
余 斌	翻译文体与现代汉语书面语	19
刘云虹	文学作品复译与翻译批评	27
丁 耘	走出翻译时代	32

资料 名家谈翻译(17) 关于翻译问题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书籍(10)

丁光训	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	40
吴新文	哲学的终结	45

卢大儒	基因研究打开的“潘多拉盒”	50
-----	---------------	----

倪梁康	《狗年月》中的海德格尔	66
陈明明	华盛顿是个滑稽可笑的城市	72

朱渊清	郭店楚简大讨论	77
-----	---------	----

赵振江	超现实主义的回声——佩拉尔塔和康斯斯的对话(编译)	85
张新颖	诗人写那些使他烦恼得几乎发疯的事	90

府宪展 记得水原 ····· 95



李家驹 适者生存——教育出版面临“第三波”冲击 ····· 100

钟洁雄 危丁明 数码时代的文化现象 ····· 104

■ 词语

殷曼婷 先锋派 (编译) ····· 110

■ 谈艺

黄 荭 孤独的探索者——记罗贝尔·布雷松 ····· 113

资料 导演不是一种艺术 (119)

邦 雄 说画 ····· 124

韦 谷 书名改不改 ····· 126

系
录
编
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辞海新知. 7 / 李伟国主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8

ISBN 7-5326-0706-2

I. 辞… II. 李… III. 百科全书—中国 IV. Z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5732 号

《辞海新知》第七辑

制 作: 《辞海新知》编辑部

主 编: 李伟国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冯 涛

版面设计: 杨钟玮 明 婕

封面设计: 杨钟玮

出 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 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

地 址: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 话: 021 - 62472088 × 344

传 真: 021 - 62537365

电子信箱: cishu@online.sh.cn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26-0706-2/N · 14

定 价: 6.80 元

编者按: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时代就是翻译的时代,我们的历史就是翻译的历史。翻译问题已不仅仅是翻译家所关注的,研究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搞符号学的,人类学的,语言学的,无不深感翻译对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于是,我们会提出许多疑问,诸如,翻译的本质是什么?以交流为目标的翻译是可行的吗?不同语言的转换能否传达对世界的不同的切分和认识?翻译如果不只是停留在词语间的转化,那它又是如何左右着一个民族的思维结构,文化形态?随着西风东渐,随着大量翻译作品的涌入,翻译文体又是如何影响着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形成?如果说,我们的思维结构,现代汉语都打上了西方模式的烙印,要摆脱西方文化殖民的唯一途径似乎只有从回到古汉语做起?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文化殖民。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民族的新的思想及表达文体?基于以上的思考,《辞海新知》第七辑的专题为“翻译时代”,特别约请近年在国内翻译研究上有建树的许均、汪堂家、余斌、刘云虹、丁耘等先生撰文,从不同的方面探讨翻译问题。

译
海
新
知



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

..... 许 钧

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求真。限于字面的翻译，能否传达词语及词语之后的“真”？在我看来，思与言，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翻译所固有的“求真”的本质，应该是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

有关翻译的问题，学术界终于开始有人严肃对待了。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内，翻译的话题，好像一直是翻译家的事。而翻译家，由于更多的精力用在实践上，谈论翻译，自然而然都局限在技的层面，讨论最多的是怎么译。

近20年来，情况有了改变，搞哲学、符号学的，研究历史、文化、文学的，还有语言学家、作家，对翻译问题似乎都有一点兴趣。诸如翻译本质，翻译的可行性，翻译的作用，翻译的思维过程，影响翻译的因素，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翻译的道德等等，这些有关翻译的问题，看来都是绕不过去的。于是，在国际上，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声音：意大利著名哲学家恩贝托·埃科在意大利波洛那大学成立90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题为“寻求沟通的语言”的演讲，他宣称：“当代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翻译是可行的吗？”（《跨文化对话》卷四，上海文化出版社）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明确指出：“翻译问题是比较文学的中心问题。”印度学者泰贾斯维尼·尼兰詹娜在1992年出版了《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主义语境》一书，认为“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要“把译文置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更是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

念问题”。美国学者勒菲弗尔1990年主编了一部论文集,叫《翻译、历史与文化》,在导论中明确指出:“翻译一直是决定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主要影响力”。

在国内,不少学者也把注意力投向翻译问题。乐黛云在《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发展趋势》中指出:“而今比较文学的翻译学科不能不对语言差异



极大的不同文化体系,文学翻译的难度大大增加,关于翻译的研究随之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当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哲学家苗力田在汉译《亚里士多德全集》总序中这样写道:“古代外国典籍的翻译,是一个民族为开拓自己的文化前途,丰富精神营养所经常采取的有效手段。”德国哲学研究专家倪梁康从根本上提出:“译,还是不译——这是个问题。”(《读书》1996年第四期)

研究翻译,对“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翻译,既可指翻译活动的主体,即翻译者;也可以指翻译的行为和过程;还可以指翻译活动的结果,即译文。三种含义集于一身,主体、行为与结果,交织在一起,这使得对翻译的界定和翻译的研究显得复杂。

我们暂且先取“翻译”一词的动态意义,即翻译行为。唐代

当歌德看到自己的诗作被译成异语,获得极妙的效果时,他以形象的语言臂叹道:“我刚刚从芳草地采摘了一束鲜花,满怀激情地手捧着鲜花回家。因手热,把花冠热蔫了;于是,我把花束插进一只盛有凉水的花瓶中,我眼前即刻出现了怎样的奇迹!一只只小脑袋重又抬了起来,茎与叶重显绿色,整个看去,像是仍然生长在母土里,生机盎然。而当我听到我的诗歌在异语中发出奇妙的声响时,我体味到的也正是这一感觉。”



语言的意义是否可以捕捉?操不同语言的人对同一的现实的认识是否一致?他们之间是否可以达到真正的交流?不同语言的转换,能否传达对世界的不同切分和认识?一门语言的意义是否可以不走样地在另一种语言中传达出来?人类经验是否有其普遍性?若没有,以交流为目标的翻译是否可以进行?

涉及的内容是丰富的。在我看来,翻译,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从思到言,就是翻译。这包括了“理解”与“表达”两个方面,思的特征是理解,言是表达,是理解基础上的创造,两者密不可分。海德格尔在《论真理的本质》、《艺术作品的本源》等文中多次谈到翻译问题。在谈到罗马-拉丁思想对希腊词语的吸取时,他这样说:“从希腊名称向拉丁语的这种翻译绝不是一件毫无后果的事情——确实,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它是无后果的。毋宁说,在似乎是字面上的、因而具有保存作用的翻译背后,隐藏着希腊经验向另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渡。罗马思想接受了希腊的词语,却没有继承相应的同样原始的由这些词语所道说出来的经验,即没有继承希腊人的话。西方思想的无根基状态即始于这种转渡。”(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按照孙周兴的解释,海德格尔的这段话的前半句,主要说明“翻

译学家贾公彦说:“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美国语言学家奈达说:“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再现与原语的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文体而言。”这显然是一个语言学途径的定义。

译不只是字面改写,而是思想的‘转渡’”。后半句则进一步强调“罗马-拉丁思想对希腊思想的‘翻译’只是字面上对希腊之词语(复数的 Wörter)的接受,而没有真正吸收希腊思想的内涵,希腊的‘话’(单数的 Wort)”。这里,涉及到了思与言的关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求真。限于字面的翻译,能否传达词语及词语之后的“真”?在我看来,思与言,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翻译所固有的“求真”的本质,应该是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实质上,哲学家,特别是语言哲学家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对翻译研究是根本的,那就是意义和真理的关系问题。翻译,就其根本,是翻译意义。限于词语表面的翻译,能表现词语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和文明空间吗?能传达词语的真值吗?这个问题,倒给翻译提出了一个本质的要求:翻译,决不应该是字面层次的语言转换,而应是思想的转渡,是文化的移植。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埃科为何会把翻译的可行性当作当代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明白了“意义”的探究对翻译是第一位的。

翻译是可行的吗?哲学家贺麟是这样理解翻译的:“从哲学意义上说,翻译乃是译者(interpreter)与原本(text)之间的一种交流活动(communication),其中包含理解、解读、领会、移译等诸多环节。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translation),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而译文与原文的关系,亦即言与意、文与道之间的关系。”他还说,某些神秘直观论者认为这种交往活动是不可能的,可他认为“意与言、原本与译文,应该是统一的,道可传,意可宣……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



贺麟 (1902—1991) 字子诏。生于四川金堂,1926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又先后在美国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本科及其研究院研读西方哲学史,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0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德国古典哲学。次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1955年起任中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在30年代曾作《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1944年写成《近代唯心论简释》时人称之为“新心学”。建国后专攻于西方哲学的教学、翻译、研究。著有《现代西方哲学讲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译有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等,并任《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主编。

以相通之处”(贺麟《谈谈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3期)。贺麟对翻译的这一认识,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至今在中国,翻译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简单转换,·一种纯摹仿的技术性工作,不需任何创造性。这种观点,直接源自于人们对世界、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的简单化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可行性是深信不疑的,认为人类的经验、思维具有一致性,人类的认识形式具有普遍性,因此,人类的交流是可行的。但是,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却对翻译的万能提出了质疑。如新洪堡学派的加西尔认为语言不是一种被动的表达工具,而是一种积极的因素,给人的思维规定了差异与价值的整体。任何语言系统对外部世界都有着独特的切分。语言系统沉积了过去一代代人积累的经验,向未来的人提供一种看待与解释宇宙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并非仅仅由人们通过语言去理解与想像;人们对世界的观念以及在这一观念中生活的方式已经被语言所界定”(转引自乔治·穆南《翻译的理论问题》,伽利玛出版社1963年版)。这一观点实际上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那就是语言的意义是否可以捕捉?操不同语言的人对同一·的·现实的认识是否一致?他们之间是否可以达到真正的交流?这也就在理论上给翻译提出了一个个需要解答的问题:不同语言的转换,能否传达对世界的不同切分和认识?同一·语言的意义是否可以不走样地在另一种语言中传达出来?人类经验是否有其普遍性?若没有,以交流为目标的翻译是否可以进行?

二

上文中提出的有关翻译本质、意义与交流的问题,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在理论上,翻译确实存在着种种障碍,但人类是不能没有交流的,交流也是不能不以理解为基础的。从实践看,只要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人们需要交流,就不能没有翻译。虽然翻译活动受到整个人类知识水平以及对世界的认识水平的限制,但翻译活动始终在进行着,它所能达到的交流思想的水平也在不断发展。关于翻译活动,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雅各布森认为有三种类型: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在我看来,这三种类型几乎概括了人类所有狭义的翻译活动。

布拉格学派 (Prague School) 亦称“功能语言学派” (School of Functional Linguistics)。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别之一。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1926年布拉格语言学会成立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成和本派的成立。主要代表有：特鲁别茨科依 (Николай Сергеевич Трубецкой, 1890-1938)、马特西乌斯 (Vilem Mathesius, 1882-1945)、雅谷布森。认为语言是与其他社会现象有联系的符号体系, 反对把语言看成一种自足系统和与其他社会现象脱节的意识形态体系。注重研究语言功能和音位, 并用描写音位体系方法扩大研究其他语言现象。特鲁别茨科依的《音位学原理》具体运用瑞士索绪尔的系统、差别、对立、价值等一系列概念, 通过研究语言的音位系统证明语言是一个系统, 或语音是一个系统中的系统, 不仅研究内部语言学, 而且对广义的语言学问题进行研究。雅谷布森等人在20年代即以语言学理论研究文学作品及其他外部语言各领域, 推广了结构概念的运用和结构主义思想的传播。在布拉格学派诞生以前, 索绪尔的“系统”概念并未在语言学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布拉格学派的研究充分说明了系统或结构概念的深刻意义。雅谷布森的音位研究影响了法国莱维-施特劳斯把结构主义观点运用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

语内翻译, 指的是同一种语言, 同一种文化内的翻译。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 在某种意义上, 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 不能没有传统, 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 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 对《四书》、《五经》的不断“翻译”, 不断阐释, 我们便可理解, 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 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

语际翻译, 指的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我们现在通常所指的翻译, 就是语际翻译。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 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 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 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辉煌, 多么伟大, 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 在不断碰撞中, 甚至冲突中, 渐渐相互理解, 相互交融。在这个意义上, 翻译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 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最近又在读牛津大学副校长阿伦·布洛克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 一书, 是著名翻译家董乐山译的, 书中谈到翻译对西方文艺复兴, 对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无论是发生在9世纪的加洛林王朝的古典文化的复兴, 发生在12世纪的所谓的原始复兴, 还是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 无不伴随着翻译的高潮, 或者说, 无不是以翻译为先声。在文艺复兴时期, 那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都非常重视翻译, 他们几乎个个都是翻译家。没有

他们对古希腊、古罗马文献的新的理解、新的阐释、新的翻译，恐怕就没有文艺复兴的不断发展。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语际翻译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著名学者季羡林说过一段话，非常深刻：“若拿河流来作比喻，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數大大小小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中国翻译辞典》序，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符际翻译，指的是不同符号之间的转换。按照符号学的观点，语言是一个相对自足的符号系统，音乐、绘画，也是符号系统。人类创造文化，依赖的是符号活动。符际翻译是以意义传达为目的的。诗歌、音乐、绘画有其相通之处，它们之间的翻译有着广泛而丰富的形式。罗丹创作过一座泥塑，很有名，叫《丑与美》。泥塑所表现的老宫女，皱缩的皮肤像木乃伊的一样，她“对着自己衰颓的体格叹息。她俯身望视着自身，可怜的干枯的乳房，皱纹满布的腹部，比葡萄根还要干枯的四肢”（葛赛尔著《罗丹艺术论》，傅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座泥塑，可以说是对法国15世纪著名诗人维庸《美丽的老宫女》一诗的理想传译。在当今世界，音乐、绘画、诗歌、小说、影视等符际之间的转换与传译，有着无限的活动空间，对拓展人们的文化视野，认识不同创作符号的深刻内涵，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考察三种不同类型的翻译的历史，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翻译的功能和作用。那么，翻译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万·贝尔曼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一书中，对翻译的作用有着生动而深刻的描写。著名诗人歌德一直呼唤要打破国界、积极进行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而翻译，在歌德看来，在人类文化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不仅起着交流、借鉴的作用，更有着创造的功能。德国文学的生命，要得到地域上的扩展，必然要借助翻译。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无疑是为原作延长生命，拓



展生命的空间。歌德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歌德、他的文学生命之花之所以开遍异域，正是靠了翻译。当歌德看到自己的诗作被译成异语，获得极妙的效果时，他以形象的语言赞叹道：“我刚刚从芳草地采摘了一束鲜花，满怀激情地手捧着鲜花回家。因手热，把花冠热蔫了；于是，我把花束插进一只盛有凉水的花瓶中，我眼前即刻出现了怎样的奇迹！一只只小脑袋重又抬了起来，茎与叶重显绿色，整个看去，像是仍然生长在母土里，生机盎然，而当我闻到我的诗歌在异语中发出奇妙的声响时，我体味到的也正是这一感觉。”（贝尔曼《异的考验》，伽利玛出版社1984年版）这里，采摘鲜花的，是译者。诗歌之花一旦离开故土，便有可能凋谢。然而，译者将诗之花插入异语的花瓶中，使其英姿焕发，仿佛生长在故土。这无疑是个奇迹，实际上，这是各民族文化之精华相互移植成功的象征。

翻译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如今已经成为翻译界、文化界，甚至史学界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湖北教育出版社近两年推出了一系列研究翻译历史的著作，如马祖毅的《中国翻译史》，马祖毅、任荣珍的《汉籍外译史》，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等。另外还有李亚舒、黎难秋的《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热扎克·买提尼亚孜的《西域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前些日子去法国，见了巴黎第八大学前研究生院院长弗烈德·施哈德，他告诉我，欧盟有关部门正计划从翻译的角度，来研究欧洲与中国的思想与文化交流史。他认为，考察中西交流史，不能不去研究翻译活动及其历史与作用。看来，如何准确地为翻译的历史作用定位，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三

翻译和有关翻译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有技的层面，也有道的层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就翻译思考而言，哲学家们关心的是思与言、真理与意义的关系，符号学家关心的是符号与意义的生成，语言学家关心的是语言的转换与意义的传达，文化学者关心的是语言的沟通与文化的交流，翻译家们则努力探索如何正确处理原著与译作的关系，尽可能忠实地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原著的意义和各种价值。所

有这些问题,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给有志于翻译研究的人们提出了挑战,也赋予了机会。写到这里,想起了法国哲学家萨特在1948年写的那部著名的论著,书名叫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直译为《什么是文学》,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文学论》。萨特在书中探讨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分为四章,一是《什么是写作》,二是《为什么写作》,三是《为谁写作》,四是《作家在1947年的境况》,涉及到了作家创作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我想,若要研究翻译,不妨也效仿萨特,写一部《什么是翻译》,也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什么叫翻译》,第二部分叫《为什么翻译》,第三部分为《为谁翻译》,第四部分改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翻译家》。按道理,还应加上《如何翻译》一章,但我想,只要翻译的实质、目的、作用、原则等基本问题弄清了,对于“如何翻译”,认识就比较容易统一了。若能有哲学的指导,又具备宽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批评精神,再加上翻译家们在艺术上的不断探索,翻译和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是有望不断得到解决的。

关于翻译问题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书籍:

- | | |
|--------------------------------|-----------------------------|
| (1) 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许均主编) | 《翻译与批评》(周仪、罗平著) |
|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郭建中编著) | 《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黄杲析著) |
| 《苏联翻译理论》(蔡毅、殷京华编著) | 《文化翻译论纲》(刘宓庆著) |
|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许均等编著) | 《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奚永吉著) |
|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廖荣奎等编著) | 《翻译学》(谭载喜著) |
| 《当代德国翻译理论》(桂乾元编著) | (3)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
| (2)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 《英汉翻译津指》(陈生保编著) |
| 《翻译新论》(杨自修、刘学云著) | 《等效翻译探索》(金隍著) |
| 《英美名著翻译比较》(喻云根主编) | 《翻译与人生》(周兆祥著) |
| 《汉籍外译史》(马祖毅 任荣珍著) | 《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金圣华 黄国彬主编) |
|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著) | 《文体与翻译》(刘宓庆著) |
| 《翻译思考录》(许均主编) | 《汉英科技翻译指要》(冯志杰著) |
| 《歌剧翻译与研究》(孙慧双著) | 《法窗译话——法律翻译絮谈》(陈忠诚著) |
| 《翻译名家研究》(郭著章等编著) | 《文学翻译十讲》(刘重德编著) |
| 《中国翻译史》(马祖毅著) | 《英汉比较与翻译》(陈定安编著) |

可译性、不可译性与 思维模式的转换

还堂家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成了原书分作《它们之间有一交叉可以追溯到何处》唐代高僧赞宁在《高僧传》中曾指出：“佛经者，如翻西国，言词虽异，但作花言花言同耳”（《高僧传》三集卷二）“定”与“译”之别，与“翻”之别。又翻译家就说过，“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秋革是，北方曰译”。用“翻译”去对译英文的 translate，法文的 traduire 和德文的 übersetzen 基本能体现原文的古义与今义。古往今来，翻译一直是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彼此了解、相互学习不可或缺的手段，即使是单方面的文化引入也离不开翻译工作。不管一些人如何贬低翻译，他们都不能无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翻译与民族的交往共生，与文化的互动同在。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接受史。从佛经北传到西风东渐，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翻译既开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启蒙，也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造。

从表面上看，翻译不过是语言结构的转换，但在实质上，由于语言结构是思维模式的反映，翻译也就成了思维模式的转换。虽然语言与思维不是照镜子式的反映关系，正如德里达所说，想到的东西总比语言表达的东西多些或少些，我们在生活中常说“言不由衷”、“言不尽意”、“言近意远”等等就是例证。但是，语言既是思维的基本工具，也是思维成果的载体，语言的基本结构能大致体现思维的定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一

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1930-) 法国哲学家, 后结构主义代表之一。生于阿尔及利亚, 19岁回法国就学, 后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20世纪60年代为《泰凯尔》杂志的核心人物。后任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认为作为西方文化基础的是言语中心主义, 它是在场的形而上学与语言中心论的结合体, 崇尚声音语言, 贬低书写语言, 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与以后的结构主义都没有超出言语中心主义, 因而提出解构主义。批判索绪尔的说话对于书写的首要性, 重新定义书写语言, 认为它包括言语以及其他的发音动作, 强调文字语言更接近于纯意义。解构的理论充分展开了索绪尔的差别是语言价值的源泉的理论, 批判了索绪尔的能指表达所指的静止的符号理论。提出一种动态文本理论, 认为文本是有生命力的, 各个文本之间交互作用、互相渗透、互相转化, 每一文本要参照其他文本才能得到它的意义, 而且这种理解是发展的, 就像撒播种子一样引起继续的意义认识。他又把这种意义的变化发展称为痕迹。认为文学作品也是这样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即文学信码的解读, 在解读过程中作品的意义得到进一步的理解, 因而阅读也是创作。主要著作有《论书写语言学》(1967)、《声音与现象》(1967)、《撒播》(1972)、《哲学的边缘》(1972)、《立场》(1972)等。

个民族的语言培养了
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
如果说词汇的丰富性
表现了人们对对象进行
认识的深度与广度, 那
么, 语法就表现了对象
向我们呈现的可能方式。
譬如说, 德语听起来生
硬, 但其语法规则严整
有度, 德国人的细心、耐

心和周密及其规则意识在语言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听学术讲演时, 你常常必须耐心听完最后一个字才能确切了解一句话的意思。因此, 德语的严谨性很适合人用它作哲学和逻辑的思考。不知是德语的复杂规则造就了德国人的细心、耐心与周密, 还是德国人的细心、耐心与周密需要复杂的德语来表现, 两者之间肯定有着我们仍然未能揭示的关系。与德语相比, 法语像汉语和意大利语一样更富有乐感, 但自17世纪开始, 法语被引上了理性发展的道路, 语言变得更加凝炼, 更为精确 (不仅词义的界定更精确, 而且语法更为严谨), 这不仅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条件, 而且使法语很适合文学创作, 因为文学创作不仅需要大量生动的语汇, 而且需要能表达细腻情感的各种方式。与德语和法语相比, 古汉语从字形到音韵都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但它凝炼而不够精确, 句子与句子的逻辑关系不够清晰。这一点既给人以想像空间并使汉语成为充满诗意的语言, 也造成了思维的模糊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人们把各种理论发展成环环相扣的逻辑体系。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发现, 德、法语可以用一个定语从句来表达的东西, 汉语不得不分成几个句子, 这当然意味着弱化语句的逻辑关系。19世纪后, 随着大量翻译作品的出现, 以及白话文运动的开展,

汉语经历了结构性调整。不仅大量的词汇进入了汉语从而丰富了中国人的语言、思想与生活,而且词义的界定更为清楚,句子结构更加适合于作逻辑推理和理论论证。这无疑为科学、文化的普及和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由于大量翻译家和语言学家的努力,汉语渐渐走上了理性发展的道路。这不仅表现在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的产生和完善,而且表现在语法分析被引入到教育领域。西文的汉译使人们对时态和语态有了更多的敏感,对修饰语与被修饰语的关系有了更精确的认识,对句子的逻辑关系有了更多的关注,对词义的界定有了更精确的要求。尽管现代汉语因欧化而失去了古汉语的简练与美感(特别是它的乐感),同时对文字的过下行政命令式的简化客观上造成了现代人对古典文化的隔膜,但是与翻译工作密切相关的20世纪的中国语言变革为更为注重逻辑思维的各种学术研究创造了条件。许多人抱怨现代汉语句子越来越长,但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不仅是与汉语句法的欧化有关,因而与翻译有关,而且与现代人要求对概念进行细致的界定有关,与现代人要求化深邃为平易,化模糊为清晰的思维有关,因为对一个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需要更多的定语,而定语的增多是人对事物认识细化的表现,知识的系统化更离不开这一点。

翻译的确丰富了我们的思维,改变了我们的思维,也丰富了我们的文化,改造了我们的文化。翻译不仅是单词、语法结构的转换,也是文化精神的传递。有人说,翻译就是创作,这当然是就某些文学作品而言的。如果把这种观点推广到法律、经济、政治和学术领域,那自然是非常有害甚至是危险的。从另一方面看,随着机器翻译的进展,翻译似乎也越来技术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只要机器不能代替人思维,机器翻译就不能代替人的翻译,在文学作品和历史典籍的翻译方面尤其如此。就像历史研究一样,翻译还能培养思维的历史感,因为语言和生活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语言的变迁也反映了历史的变迁,翻译不得不顺应这种变迁。诚然,历史的典籍随着解释而常新,但是,许多词的古义与今义有着极大的差别,如果用今义代替古义去对译古代的作品,我们难免犯一些自己难以觉察的错误。如果借助一些不完善的语言辞典并依据一些单词的现代意义去翻译古代作品,难免将今人的观念强加给古人,其结果必然是对古人的歪曲。譬如,

有人在译笛卡尔的著作时把 robe de chambre 译为“睡衣”。而服装史表明，17世纪的法国人并不穿今天意义上的睡衣，他们往往光着身子睡觉。这个例子表明，翻译同样需要我们尊重历史，尽管我们无法将历史复原，但我们应尽可能接近历史，把自己置身于历史的氛围中，了解古人的生活，体会古人的心境，与古人一块思想并通过翻译实现古今思维结构的转换。

翻译通过促进文化的开放来促进思维的开放。它在追求统一中保留着差别，它让我们学会尊重差别并欣赏差别。“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我们同样可以说，“一语一世界，一词一如来”。语言就像莱布尼兹笔下的“单子(monad)”映照出一个民族的生存处境和“生活世界”。无论我们说“人是语言的动物”还是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都凸现了语言对人的存在的本真意义。人在语言中成长，在语言中相互开放，在语言中成为社会之网的网上归结。惟其如此，翻译乃是透过另一种语言对人的生存状况的一种展示。语言不只是工具，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它不仅将我们的观念固定下来，而且将一代人的观念留传给子孙后代。因此，语言是文化的基因，是死人与活人对话的场所，它将现在、过去与未来联系成一体，使之成为滔滔不息的长河。从这种意义上讲，语言仿佛是时间之流的河床，没有语言，时间就没有意义。维特根斯坦说，“语

言是世界的图画”，翻译意味着展示另一个世界的风景。实质上，翻译不仅仅是图画，它本身关乎人的根本，它是精神的沃土，因为人的心灵首先通过语言来培植和塑造。

海德格尔说：“人是语言的动物。”
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世界的图画。”翻译意味着展示另一个世界的风景。